

谢本书 冯祖貽 主编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 西南军网史



● 本卷主编：顾大全 贾维诚 马宣伟 顾 群

# 西南军阀史

(第三卷)

谢本书 冯祖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曹维琼  
封面设计 王才禹

## 西南军阀史

(三)

谢本书 冯祖贻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350千字 2插图

印数1—3,000册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2954-7/K·206 定价：10.80元



李宗仁



白崇禧



黄绍竑



何键



刘 湘



刘文辉



周西成



毛光翔

## 《西南军阀史》顾问名单

林 超 蒲孝荣 刘晴波 刘克光  
郝文征 韦瑞霖 丁身尊 李鸿生  
黄 铮 张江垠

# 目 录

<b>1 西南新军阀的形成</b> .....	(1)
一、“四·一二”政变和粤、桂军阀拥蒋反共.....	(1)
二、武汉政府所属湘、粤军由联共反蒋到 反共反蒋.....	(12)
三、川军易帜后的演变.....	(22)
四、新滇系的形成——龙云在云南统治的 初步建立.....	(28)
五、桐梓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	(41)
<b>2 蒋介石和湘、粤、桂军阀的争夺</b> .....	(52)
一、桂唐战争.....	(52)
二、张黄事变和陈济棠取得广东军权.....	(69)
三、蒋桂战争与何键得主湘政.....	(88)
四、两次粤桂战争.....	(108)
五、中原大战与桂系受挫.....	(124)
六、滇军入桂与南宁之战.....	(135)
七、粤桂联合反蒋和广州国民政府.....	(145)
<b>3 云、贵、川军阀混战</b> .....	(154)
一、援滇、黔东、滇黔之战.....	(154)
二、云南内战复起与“三·一一”之变.....	(173)
三、贵州毛、王之争和王、犹之战.....	(183)
四、四川军阀在川东的争夺.....	(197)
五、川军军官系的衰落和保定系的分裂.....	(208)
六、二刘大战.....	(218)

4	西南军阀对红军的围剿和堵截	(234)
	一、何键对湘鄂赣苏区的围剿	(234)
	二、桂系军阀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围攻	(245)
	三、西南军阀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256)
	四、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275)
	五、西南军阀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	(285)
5	蒋介石势力深入西南与西南军阀势力的削弱	(301)
	一、蒋介石势力进入贵州与王家烈政权的垮台	(301)
	二、蒋介石势力入川和四川军阀实力的削弱	(308)
	三、陈济棠联桂反蒋及失败与蒋桂矛盾的暂时缓和	(316)
	四、蒋何矛盾加深与何键离湘	(332)
	五、西安事变前后的西南军阀和西南地方实力派	(336)
6	新军阀统治下西南的经济、教育、对外关系	(346)
	一、西南军阀的经济掠夺	(346)
	二、西南军阀统治下的教育	(362)
	三、西南军阀与帝国主义	(374)
7	尾声——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抗战及其在解放战争中的消亡	(389)
	一、抗战初起时西南各省动向	(389)
	二、西南各省出兵抗战	(399)
	三、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在解放战争中的不同道路	(423)
后	记	(443)



# 西南新军阀的形成

---

## 一、“四·一二”政变和粤、桂军阀拥蒋反共

在北伐战争的准备阶段，蒋介石就利用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北伐出师后，他趁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内部分化之机，收编了大量军阀部队，迅速扩大自己的武装，为他实行“以军治党，以党干政”积累了政治资本。到了1927年初蒋介石集团即开始与帝国主义勾结，其反动倾向也随之公开暴露。

北伐军攻占江西后，革命势力继续向长江下游发展，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上海。这时英、美、日等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向长江下游大量增兵，企图用武力阻止北伐军进军。但当他们察觉到国民政府内部有着日益明显的分裂迹象时，于是采用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利用他们心目中的“稳

健派”作为其代理人，来打击“极端派”，从而达到破坏中国革命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发现蒋介石是它最有希望的代理人，于是在1926年底派出佐分利贞男与蒋会晤，进一步了解蒋的动向，以后并不断派员对蒋进行拉拢。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在东南即将底定之时，也在寻找帝国主义作靠山。他听从了一贯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政客黄郛的献策，开始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1927年1月中旬，蒋向日本派来的使者小室敬二郎一再表示其“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sup>①</sup>”和“愿意同日本握手”的意愿。2月，日本军部使者向蒋传达了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国民运动”。蒋当即表示“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一到南京就表明态度，你们等着瞧吧！”<sup>②</sup>2月，蒋派戴季陶赴日本表明其立场。日本外相币原由此明确地认识到蒋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sup>③</sup>。随后日本内阁根据币原提出的建议，确定了拉住蒋介石，使其压制共产党的方针。

当蒋介石勾结日本的活动取得进展后，他就竭力攻击武汉政府是“独裁”，准备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与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相对抗，并自3月初就在江西赣州、吉安、零都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运动的惨案，在九江、安庆用武力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党部和革命的群众团体，以实际行动表示其反共的决心。

北伐军攻占南京时，溃败的直鲁军侵害了少数外侨，英、美

---

<sup>①</sup>英驻日大使蒂雷向外相张伯伦通报蒋与小室的谈话纪录，见英国外交部《中国机密通信》F2664/2/10，转引自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改变的酝酿与发动》载《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

<sup>②</sup>铃木贞一等《土肥原贤二秘录》196页，转引自前注沈文。

<sup>③</sup>《币原与英使蒂雷的谈话》1927年2月21日、3月5日，转引自前注沈文

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制造了炮轰南京的惨案。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方面力劝英、美改变态度，告诫英美如果使用武力只能对过激分子有利；一方面将英、美准备对北伐军实行高压政策的图谋透露给蒋介石，授意其立即对英、美道歉、赔偿、惩办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蒋俯首听命，于28日派员往与南京事件有关的五国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此后蒋与矢田共同策划了镇压上海工人武装的具体作法。

蒋介石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他在3月26日、28日连续接见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表明其“抱维持资本家的主张”，申明“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sup>①</sup>。并任命一批资本家上层人物为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既然蒋介石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于是上海资本家以三百万元款项交给蒋使用，并承诺将再自动捐助五百万元。

蒋介石取得了帝国主义和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后，就加紧了反共“清党”，镇压上海工人武装的准备。他与在沪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及青红帮头目密谋策划反共步骤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取得军队首领的支持。他首先与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密商。李、白除了积极支持其清党反共主张外，还为其出谋划策。李宗仁主张“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分子镇压下去”<sup>②</sup>。并建议将其所率的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并整顿持有异志的军队。白崇禧表示只要调走薛岳的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及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便够了，这种军事调动有三至七天即可完成。李、白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采纳。此后蒋即密电驻守两广的李济深和黄绍竑从速来沪，共商“清党”反共大计。

<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

<sup>②</sup>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

李济深、黄绍竑秘密经香港连袂抵达上海后，蒋介石即于4月1日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何应钦、古应芬等举行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首先提出反共清党、镇压工农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张。蒋所召集的到会者都是反共的，自然不会有相反的意见。李济深和黄绍竑都强调后方工农运动对他们的统治的危害性。在前方的何应钦则诬称南京惨案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外国领事馆和侨民引起的。白崇禧则污蔑共产党人离间北伐军，工人群众要冲入租界。声称如不清党反共，帝国主义将进行武装干涉，北伐事业将被断送等等。会议取得了清党反共和建都南京的一致意见。

为了使“反共清党”取得合法的名义，蒋介石继续召开有两广军事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事实上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而会议却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名义，通过了《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转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负责执行。这样蒋介石集团就用盗窃中央名义的手法，完备了国民党内的组织程序，以执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为由，公开进行反共了。

此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又在4月9日联合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公开反对共产党，指责国民党左派，否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极力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至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政治上完成了叛变革命的准备。

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叛变革命的准备的同时，在武装力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反共“清党”的部署。他到上海后就勾结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一批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用以对抗“上海总工会”。蒋还根据白崇禧的意见将其认为不可靠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从闸北调往南京，

因派投靠北伐军不久的周凤岐二十六军担任驻沪防务。9日成立了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经过民选建立的上海市临时政府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鲠骨在喉，于是他饬令其“暂缓办公”，并策动政府委员退出政府。4月8日，蒋介石宣布由吴稚晖、白崇禧、钮永建、陈果夫等组成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作为上海最高军政机关，彻底扼杀了这个民选的上海市临时政府。

蒋介石一面加紧屠杀人民的准备；一面使用欺骗手段麻痹革命人民。3月28日蒋介石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sup>①</sup>蒋介石还给上海总工会亲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蒋介石在政治、军事方面完成其反革命政变部署后，于4月9日离沪赴宁，临行前将其政变计划交由白崇禧负责指挥，并安排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留驻上海，监督执行。

11日，杜月笙以“请客”为名，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至他的寓所，然后将汪绑架到枫林桥杀害。12日凌晨4时，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升起了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好的“中华共进会”青红帮流氓袖佩白色“工”字臂章，自法租界冲出，分向闸北、南市、沪西等地与反动军队一起动手，向工人纠察队进攻。在闸北他们包围了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会馆内工人纠察队二十余人奋起抵御，不久即有大批二十六军官兵开到，以调解为名，先假作将青红帮流氓缴械，然后逼令纠察队缴枪。随即由“上海工界联合会”将总工会会所占据。与此同时二十六军在青红帮流氓的配合下，采用突然袭击或欺骗手段先后在闸北、南市、曹家渡、浦东、吴淞等地区解除了二千七百余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在遭受突然袭击中死伤三百余人。

<sup>①</sup> 《申报》，1927年3月29日。

12日缴械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深知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被击溃。白崇禧、周凤岐即以淞沪戒严司令部名义发布布告，诬称流氓袭击工人为“工人内讧”，所以缴械。同时颁布严禁罢工令，声称：“如敢故违，即系甘心破坏国民革命”，就要“不问首从”，“严惩不贷”。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屠杀，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市民代表会、临时政府及革命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声援上海总工会。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发布了紧急罢工命令和总同盟罢工宣言，当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二十万人以上。总工会并在青云路广场举行工人群众大会，到会工人六万余人，学生和市民参加者甚多。会后工人群众结队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交还纠察队枪械，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周凤岐部从各里弄中奔出，向请愿者开枪，当场被击毙的群众达百人以上，伤者更难以数计。其时大雨如注，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

宝山路群众请愿大流血后，反动军警重新占领被工人夺回的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工人纠察队指挥部，并陆续封闭和解散上海市一切革命团体。与此同时反动派疯狂搜捕屠杀工人领袖，无数优秀共产党员人和工人领袖如陈延年、赵世炎、张佐生、郭伯和、杨培生等，均在这时期英勇地牺牲了。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李济深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大屠杀，把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蜕变成为蒋介石军事独裁政府的重要支柱。

早在北伐出师时，李济深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驻守广东总司令部的实力地位掌握了广东的重要权力。北伐军出师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大都北上，在此情况下，广州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迅速向右转。反动资本家压迫工人破坏工人运动的事件不断发生，几乎所有各县的政权都被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所把

持，当贫苦农民与大地主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大地主一边。总司令部所辖驻广东的部队，特别是李福林部第五军，常以“剿匪”为名摧残农会。

1926年底，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改组了左派占优势的广州市党部，委李济深等组织特别委员会接管市党部，李济深并继李福林为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至此李济深进一步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的实权。

李济深在参加蒋介石所召开的反共会议后，与古应芬于13日返抵广州。14日，李济深、钱大钧（广州市警备司令）、邓彦华（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召开有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发动反革命政变部署。会议决定钱大钧担任临时戒严司令，徐景唐（十三师师长）担任石圻及花地芳村一带警戒，邓彦华担任市区搜索，李福林担任河南警戒，海军担任河西警戒。15日凌晨2时，戒严司令部实行戒严，断绝交通。此后不久反动军警分三路向工人纠察队和总工会进攻。一路由第四军派兵两连会同公安局保安队共三百余人包围粤汉路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一夜，互有死伤，翌晨钱大钧派兵一团，铁路工会亦有农军相助，终因纠察队势弱，不能与敌，被缴械。是役粤汉路方面，死农军及纠察队二百多人”<sup>①</sup>。第二路军队两个营进攻广三路总工会。纠察队与之激战二小时，死数十人，被捕工人十余人。第三路军警进攻广九路工会，工人因无准备，被击毙者甚多。与此同时军警还捣毁了工人代表大会会址，捕去工会干部多人。军警还在广东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等御用组织的带领下，封闭了工代会下属的各工会，捕去许多工会领导人。

15日下午，国民党在粤的中央执监委、广东省党部执监委员、广州特别市党部执监委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在南京中央政府未成立前，广东设特别委员会，并授以广东党务、政治、军事最

<sup>①</sup> 《湖南民报》，1927年5月12日。

高权力。会议推举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为特别委员会委员。特委会当日发布布告竭力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宣布联席会议“一致议决将该党分子克日扫除”，并与武汉中央党部“即日宣布脱离关系”，并通令“本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sup>①</sup>。

同日，广州黄埔军校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诬称共产党为“少数奸徒，意存破坏”。随后广东特别委员会在黄埔军校中大肆逮捕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很多……此外逃到香港的有三十多人，澳门有二十多人，在广州病院中有四五百人，逃到韶关依陈嘉祐的有四百多人”，逃到武汉的一百多人，“最苦的就是在上海，香港和澳门的，他们仍有被捉去的危险”<sup>②</sup>。反动军警于当日还包围了中山大学，由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带领逮捕进步学生五十多人。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省农会、广州市工代会、中共广东省委及共青团广东省委、妇女解放协会等机关和群众团体均遭破坏。反动军警还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刘尔崧、邓培、谭其统、张瑞成、毕磊、熊锐、熊雄、肖楚女、李启汉、李森、何耀全、李亦愚等被捕牺牲。其他被捕的工人、农民、干部、共产党员达五千余人，其中被屠杀、活埋者达二千一百多人。农会被封闭者达二百余处。

在“四·一五”大屠杀前夕，香港方面帝国主义走狗何世光、陈公寿和商团叛乱事件中潜逃赴港之大买办陈廉伯突然来到广州，大屠杀后香港买办资产阶级皆设酒鸣炮表示祝贺。陈廉伯一登而为省政府委员<sup>③</sup>。这就充分说明了广州大屠杀完全是代表大

<sup>①</sup>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sup>②</sup>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纪录》，1927年5月23日。

<sup>③</sup> 《湖南民报》，1927年5月12日。



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大屠杀后，又在汕头开始了血腥的屠杀。26日，他们封闭了汕头总工会，捕去工人千余人。国民党市党部被解散，执行委员李春涛、廖鸿伯等惨遭杀害。

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在城市进行大屠杀外，还把屠杀的重点指向广东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海陆丰。5月7日粤军三个团进攻海丰。农军在海丰、惠阳边界的分水坳、红花池布防，与惠州开来的军队刘炳粹团激战一天，后因弹药不继，加之粤军两个团从汕头开来，两面夹攻，农军被迫主动撤出海丰县城，转入乡村坚持一个时期斗争后，转移到五华，后退到江西、湖南边界。

粤军三个团进入海陆丰后，纠集民团，四出清乡，摧残农会，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被捕被杀者不计其数。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同时，新桂系首领也在广西全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血腥的屠杀。

新桂系首领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一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1925年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成立后，李宗仁、黄绍竑任广西党务特派员，指导广西全省党务，黄并任省民政长（即省主席）。但是他们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很不理解。1926年1月，黄绍竑根据县长黄守先的要求，指派收编的旧军阀陆荣廷残部刘日福旅所属龚寿仪团，配合县警、民团大举向东兰农民协会进攻，反动军警与土豪劣绅一起到处捕捉“拔党”，东兰农民被抢的四百一十多户，被杀害的一百四十多人，农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东兰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社会上广泛揭露广西当局的暴行，国民党中央和广西省党部对此事件颇为重视，对案情进行了反复调查，加之东兰农民奋起反抗，乘军警撤退之机攻占了东兰县城，赶走了黄守先，广西省党部任命陈勉恕（共产党员）为县长。此后黄绍竑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是“不得不为之解放运